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第1022期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37 代号: 1-267



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伟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宏观调控上贯彻稳中求进、实现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需要宏观调控 兼顾“双重风险”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新阶段，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占全球GDP的比重由18%上升至14%左右。人均GDP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从贫困状态进入温饱（1998年）又上升至上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也发生着历史性变化。

自1978年至1998年上半年，除中间个别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究其原因，既有来自发展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均发生在这一时期：1985年CPI达到9%以上，1988年达到18%以上，1994年达到241%，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短缺导致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高预期。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控制通胀为首要，宏观政策方向长期紧张。

自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底，同样除少数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究其原因，从内需不足来看，是由于周期性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增长需求动力不足；从外需疲软来看，是由于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需求疲软的产能过剩，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持续性增速下滑均发生在这一时期：1998年后发生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及乡镇企业数量下降，2008年后的连续15个月的增长速度下滑。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从前一时期的反通胀转变为保增长，宏观政策方向从长期紧缩逆转为扩大内需，即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则更进一步上升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10月，我国宣布率先从反危机政策退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既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巨大压力（成本推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需求疲软），即所谓“双重风险”并存。究其原因，在需求侧是内需不足又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所形成的总需求疲软，从而使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目标和方向的选择上难以像以往那样明确，双重风险并存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简单地选择一种风险的管理而不惜加剧另一种风险，因而既不能全面扩张，又难以全面紧缩。这是因为，双重风险治理所要求的政策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又互为成本的。因此，宏观经济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全面扩张方向，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以兼顾双重风险的防范。尽管这种政策反方向组合（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相对前期偏紧的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但不至于为防范一种风险而

同时加剧另一种风险，从而增大宏观调控的风险。

进入到2017年，基于经济在短期活跃但长期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三期叠加”的总态势依然存在，且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上升，宏观政策在保持稳中求进的总体格局下，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相对进一步从紧，以抑制金融泡沫。显然“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是适应新常态下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的政策组合，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首先是要兼顾新失衡的“双重风险”。

稳中求进需要宏观调控 守住“双底线”

就现阶段看，中短期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周期性力量中，债务周期是影响中国经济是否发生危机的重要力量。其背后的逻辑主要表现为：“债务—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以货币与银行信贷为主的债务形式投放给国有企业，以此开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项目为主的投资项目，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投资收益率和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逐渐弱化了“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效用；与之相适应，高债务矛盾加剧，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成为经济稳定的威胁。从国际上通用的债务危机指标看，我国债务风险隐患较大；从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来看，更是如此。从信贷缺口看，我国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缺口债务率的实际值与长期趋势之间的缺口，自1995年以来不断攀升。尽管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同国家承受债务的能力有所不同，但与其他国家横向比和与自身历史纵向比，高企的债务率及信贷缺口水平必须加以警惕。

投机性融资比较高，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非金融部门总债务率已经显著上升，我国新负担债务的

利息支出占当年GDP的10%以上。社会融资总额中大部分被用来还本付息，而不是真正再投资。这可能意味着，从体系上看，中国国内融资机构中投机性融资者的比重已超过对冲性投资者，经济实体逐步进入到“借旧还新→借新还息→资产负债恶化”的困境。分部门看，自2008年以来，居民部门债务以平均24%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约为11%，这表明居民部门收入对其债务的保障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国内企业部门以投机性融资者为主，且约有1/10的企业当年息税前的正利润不能完全覆盖利息。上述情况表明金融体系脆弱性在上升。

局部风险释放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市场冲击。债务市场信用风险的积累和释放已有显现，信贷市场上“偿债能力恶化→金融机构收紧→企业资金断裂→信用风险恶化”也已有所显现。虽然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债券市场违约的冲击，还是信贷市场收紧的负面效应，都还是短期的非连续性和系统性的，尚未对这两个市场的融资功能产生更大的损害。但是，由于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市场敏感性的提高，非预期的冲击有可能引发金融领域危机风险发生，进而导致经济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体系极为重要，稳增长是缓解风险的前提，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基础；防风险，尤其是金融及债务风险是底线。在稳增长防风险的双重底线下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化解债务风险赢得时间，逐步化解高杠杆的同时控制债务规模过快扩张，根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短期里及时有效地缓解债务风险，以防风险为持续稳增长创造条件，以稳增长为有效防风险创造可能。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要守住稳增长防风险双重底线，宏观调控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兼顾双重底线要求。

（下转7版）

重要言论

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各级党委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系列评论之二

光大历史新自觉

本报评论员 辛鸣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历史自觉的政党。自觉到历史方位的转换，不断变革、勇于创新；自觉到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期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我们可以讲在这所有一切的自觉中最为根本的自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政党其他自觉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连自身建设都搞不好，谈何卓有成效地治国理政，如何能成为坐镇军帐中的“主心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系列重大举措正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发扬光大着这一历史新自觉。

思想建党，旗帜鲜明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魂补钙。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是信仰主义，一个党员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键是理想信念。因此，党员首先要思想上入党，政党首先要从思想上建党。“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试想，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党会背叛立场去向对手摇尾乞怜，去向对手顶礼膜拜吗？一个有着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会用穿一身名牌戴几块名表来证明自己，会沉湎于灯红酒绿乐不思蜀吗？如何让一个有着近9000万成员的大党在思想上立起来、强起来，必然、必须也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做的就是一件，思想建党。

组织建党，团结如一人。“总和”让党的力量倍增。列宁曾经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之所以能成为整体，秘诀在于“组织力”，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中国共产党不是因执政而有力量，而是有力量才执政。这力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现代社会各种关系网络众多，各种组织形态交织，但对共产党员来说，所有组织里党的组织是第一组织，所有忠诚里对组织忠诚是第一忠诚。背离了这一点，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党的事业忠诚就是沙滩上的楼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下大力气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是强化、优化政党组织属性的集中体现。不论是锤

炼党性的“大熔炉”，还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其用力处与着力点都指向做实组织、做强组织，通过强化组织意识、组织体系、组织能力等等，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块整钢”。

制度治党，实现管党治党的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管党治党当然要以义无反顾，要雷霆万钧，要以高压态势让消极腐败不敢滋生，要以坚定意志让陋习顽症心生忌惮。但是要让管党治党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还是制度靠得住，常态化来自制度化。“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托党章这一最大规矩、最高制度，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认真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及时地把比较成熟、普遍适用的经验提炼上升为制度，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法规制度陆续出台。特别是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等一系列举措，让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治党不仅力度斐然，更站上了先进优秀的价值制高点。

毛泽东当年讲，党是人民的工具，做工具就要做好用的工具、做管用的工具。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打造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利器”，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有自觉，更有行动。



本期导读

“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内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带一路”并非一个封闭的孤立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一植根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朝向世界的提法，鲜明体现了“一带一路”总体设计中深厚的历史情感与文化情怀。

详见2版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协调发展理念

——中央党校学员“新发展理念”系列访谈之二

详见3版

如何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

——读董必武《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

详见5版

吴晓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则是中国企业的崛起。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是走了一条现代化的“不寻常路”。其中，认清“创新”和“追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和特殊战略地位，系统地研究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有效指引企业管理能力建设，推进企业能力整体性提升，进而带动我国经济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在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提升与完善，还是提供有效的现实企业指导上，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更进一步看，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理论不仅具有引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具有影响世界，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管理提升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自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基于工

厂制度的企业迅速成为各国经济博弈大舞台上的主角。在中国，自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以来，历经15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制造的规模终于超过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直至超越美国。中国人在曲折中始终坚持一股不屈不挠的气概、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终有一批能与世界企业并肩的中国企业站起来了。

当工业文明的火种在英国燃起之时，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在法国，有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十四条管理法则；到了德国，有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官僚组织理论；在美国，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德鲁克的现代管理理论等。还有那些基于著名的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分析提升而成为影响世界的管理书籍，如美国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日本藤本隆宏的《丰田制造体系的演进》等。

如今，回首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中国的管理学者该登场了”。的确，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是中国学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规律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中国企业的非凡崛起自有一番特别的心得和自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跃升，虽然有对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学习，也融会了东方传统文明“阴阳辩证”思想，却不是西方管理理论所能完美解释的，也不是大中华儒商说所能恰当诠释的。中国近40年压缩了西方企业数百年的历程，中国企业在这波壮阔的时代中后来居上式的崛起，从量变到质变，从“削足适履”到“进入无人区”，从“追赶”到“超越追赶”，个中自有其科学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当下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深入企业、沉到底、顶到天，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揭示真理、诠释真理、普及真理。

百余年来，西方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均衡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将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平衡作为企业提升绩效的核心命题。而中国领军企业的管理实践告诉人们：当变革成为唯一不变的常态，当打破平衡成为

一种主动的管理行为，当迭代、试错、流动、不确定性、灰度等等“干扰项”不再是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例外，当人与事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管理学者需要重新审视已经习以为常、曾经奉为圭臬的众多管理教条，需要翻开用“另一种逻辑”实现“非线性成长”的新型企业管理体系的一角，需要梳理中国企业“非线性成长”管理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但是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中国领军企业的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已经到来。未来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重大创新。需要看到，揭示“所以然”背后的“之所以然”才有普遍价值，并且能够被广大学习者在运用中演绎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管理学者们探究“之所以然”的努力奋斗。

（下转7版）

